

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系列·理论篇

30年

第一章 导 论

如果要对当代世界经济做一特征描述,可能难以找到统一的答案,但是开放和全球化必定是其中的基本特征。的确,在过去的 300 多年里,人类社会因为开放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推动了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几乎可以说创造了超过中国 5000 年历史的物质文明。而浙江,一个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的资源小省,在 30 年开放浪潮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走在了全国前列。因此,对浙江省 30 年的开放历程作一具有学理性的总结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浙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163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 Thomas Mun 在为其公司的扩张业务争辩中写道,“增加我们财富和金银的通畅办法就是对外贸易”(Thomas Mun,1664),从而开启了大英帝国近 300 年的开放兴盛史。而在此前不久,大明王朝迎来了其在中国统治的最后一个皇帝。这个王朝的宪法上赫然写着“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封闭的贸易政策终将这个庞大的王朝逼上内外交困的绝路。200 多年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终于胁迫着这个国度走上了开放的道路。但是,这次迟到的开放却伴随着屈辱和掠夺。而在 30 年前,这个有着全球 1/5 人口的大国又一次敞开大门,融入全球经济社会的开放浪潮之中。

开放在我们的近代和当代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是因为我们的开放走在全球的前列,也不是因为我们熟悉于开放的进程,而是因为开放是我们史无前例的尝试,是一次积极的、主动的尝试。

浙江,这个自然资源缺乏、人多地少的省份,30 年前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后列,既没有国家主导工业化条件下的大规模工业基础,也缺乏发达的

交通条件。但是经过 30 年的开放发展,浙江成长为全国最发达的省域经济体之一,大部分经济指标均处于全国前列。同时,浙江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2004 年,在 IMD 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浙江的国际竞争力在世界 60 个经济体(包括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9 位,体现了浙江在竞争优势获取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与此同时,浙江省的外贸进出口额从 30 年前(1978 年)的 0.7 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1768.4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14.6%。

为什么在开放的环境下,浙江省经济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浙江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的业绩和活力的动力源何在?开放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或者说这一快速的经济成长伴随着怎样的开放过程?这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本书正是试图从对外开放的视角对浙江的发展“故事”进行解读。

我们将通过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浙江的经济发展和开放历程进行详细、深入的梳理,试图着手以下工作:

(1)浙江省改革开放 30 年中经济开放是如何实施的?主要在开放的初始条件、推动力量、演进路径、演进机制、开放成效、存在问题等各个层面探讨浙江省开放的历程,并试图审视这一开放历程的独特性,提炼出其显著的、代表性的特征。同时对这些特征加以总括,提出浙江开放的模式特征。

(2)通过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深入探讨这一模式与其他模式的根本性差异,及这种差异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并探讨其理论层面的含义。

(3)这一模式在内涵与外延上的演进特征,对经济体本身所带来的效应,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趋势。

(4)在理论层面探讨浙江开放所具备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以及对封闭地区走向开放的可能路径和进程的借鉴意义。

二、基本概念界定

(一)区域开放

1. “开放”的概念界定

“开放”(open)原意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①也可引申为不加限制

^① 开放的基本解释有三种:一是指展开,如百花开放;二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三是指性格开朗。

的状态或者态度。区域经济开放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种进程，即区域经济主体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限制不断放松的过程，这里经济主体既包括经济体内部的，也包括经济体外部的，经济活动也同时包含经济体内部和外部。二是上述进程推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状态，即区域经济开放的程度，一般是这种进程推进到一定的阶段所达到的状态。

开放的对立面是封闭(close)，封闭与开放实际上并不仅仅源于区域当局的强制举措，也有可能源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封闭和开放的交织作用实际上可以贯穿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开放意味着交流(communicate)和交换(exchange)，这种交流和交换是依赖于特定的制度、技术和文化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封闭是必然的。虽然开放带来福利和进步，但是也同时蕴藏争夺与战争，因此可能受到权力当局的强制限制。因此在人类历史上，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经历了封闭—开放—封闭—开放的反复历程。

在经济学的视野里，开放意味着更大范围内的交易，即市场范围的扩大。这里的市场并不是狭义的产品市场，还包括要素、资本等各种可能发生交易的市场。因此，经济学给出的逻辑是，只要有交易，就存在开放，当然也存在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学视野里，开放等同于市场，开放的进程等同于市场化的进程，开放范围的扩大就是市场范围的扩大。

但是，经济学中所指的交易，既包括微观的，也包括中观和宏观的。对于个别微观的交易，自然难以称之为开放，充其量是个体的开放。我们所指的开放，更多的是指具有总和性的，即是对相对规模的个体观察和总和的结果。因此，开放更多存在于中观和宏观层面，而市场同时还包括微观层面，尽管开放也实实在在地作用于微观的行为。

由此，开放的程度也就意味着交易所能企及的水平。这取决于交易所能获得的利益与为之付出的成本之间的衡量。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交融有助于降低交易的成本，从而有助于提升开放的程度。

对于区域而言，开放即是区域内部经济体个体参与的结果，也是区域管制当局主动实施的结果。因为开放存在外部性，开放的技术并不是个人的专利，开放的市场也是区域共享的。因此，开放是一个政府可介入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在16至18世纪，西方的航海和贸易都能得到政府的大力资助。

由此，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开放是一个内外互动和社会与政府互动的进程，这个进程推动了各个层面交易范围的扩大，进而市场范围的扩大。

2. 开放的内容和层次

从大的方面说，开放包括经济的开放、社会的开放、文化的开放。经济的开放是动力，解决的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和福利提高的问题。社会的开放是



主体,一个社会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包括人际的交往和交流,这是人类社会属性的体现。文化的开放是结果,人类的开放最终促成文化的融合,区域性和种族性特征的交互共融,形成更为紧密的文化共同体。

(1)从经济开放的层面而言,主要包括:

①贸易。这是经济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导了人类绝大部分的开放历史。贸易尤其是货物贸易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相当。远程贸易的发展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之一。贸易的范围和规模有大有小,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纯粹的封闭经济从未出现过。区域之间的贸易和区域内部的贸易均是开放的体现。贸易成本的高低也体现了开放的程度。

②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自由就业。人在经济中的功能具有双重性,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要素。作为消费者,选择不同的区域消费,从而促进个体福利的均衡化是开放的重要标志;作为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就业,又促成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因此,人口迁徙的自由程度是经济开放程度的体现,不管是内部的迁徙还是内外的迁徙。

③资本流动和结算自由化。资本流动和结算是开放的高级形式,其自由化是以贸易和人口流动为前提的。没有贸易和人口流动,就谈不上资本流动和结算自由化。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离岸金融市场的蓬勃兴起造就了一批高度开放的区域和城市,这些区域和城市大都是区域性的或者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2)从区域开放的空间层面上看,可以分为:

①区内开放(intra-regional opening)是区域内部市场化和一体化,主要解决的是区域内部交易体系的完善和成本降低的问题,使得区域经济体内部的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②区际开放(inter-regional opening)是区域之间的市场交易可达性和便利性的提升过程。在外延上表现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通达性提高,产品、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障碍不断减低,区域性制度和政策趋于一致等。

③国际开放(international opening)是国家之间的市场交易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的进程。在外延上主要体现为国际贸易规模上升、跨国投资规模扩大、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货币兑换的自由度提高等。

(二)开放模式

1.“模式”与“开放模式”

模式(model)原指事物的标准样式,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称的模式一般指具有某种典型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或者变革的方式(method)、路径

(path)、进程(course)或者状态(status)。它是对复杂的实体(entity)或过程(process)的某种假设性概括,既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某种动态过程,也指相对静态的某种状态。在现有文献中很难找到关于“模式”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尽管在大量的关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中使用这个概念。不过经济社会发展现象或者过程被冠以“模式”这一称谓的,大致都具备以下基本要素:

(1)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现象或过程必须具有某些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征,或者即使具备,也远远不如该地区显得有代表性和显著性。也就是说,模式必须具备代表性(representative)和显著性(distinguishable)的特征。

(2)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现象或者过程必须具有稳定性(steady)。也就是说这种特征必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存续,而不是迅速地消亡或者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3)模式的概括必须是高度简洁的(compendious),而不是难以表述的。换句话说,被称为某种模式的区域经济社会现象或过程的概括,必须是体现核心特征的简洁性理论假设。

例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的多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中著名的“温州模式”,有学者将其核心特征概括为“市场化+民营化”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史晋川等,2004)。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模式概括的一个基本分歧是,到底是立足于经济社会现象的状态本身还是变革的过程。前者意味着模式是一种静态(或者相对静态)的描述,即对区域经济社会的某个(些)领域所发生的具有典型性事件的特征的简洁性概括。后者强调区域经济社会某个(些)领域变革的独特路径或过程,侧重于动态过程的描述。如对“温州模式”的描述,有学者就将其核心特征概括为“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1984)。

立足于静态还是动态过程来描述模式特征,取决于“模式”本身的典型性体现在何处,或者说,代表性或可能的借鉴意义在哪个层面被更加丰满地体现出来。如果是经济社会某个(些)领域的某种状态是极具特色的,则对状态特征的描述可以成为模式核心内涵的有效概括,反之,如果是达到某种(些)状态的路径和过程更具特色,则模式核心内涵的描述应该侧重于路径描述。

按照上述的理解,一个区域的开放模式(opening model)也应该包括状态特征和路径特征。所谓开放模式的状态特征,是指一个区域或者经济体与区域外界的经济体发生交易(transaction)和交流(communication)(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的形式、程度。例如用“两头在外”描述一个地区生产的原材料和销售的市場都在经济体外部的生产贸易模式。而开放模式的路径特征则是指,一个区域或经济体实现从封闭到对外交易和交流过程的程序、路径和过

程等。例如用“进口替代”描述一个经济体通过政府特定的产业政策鼓励进口产品的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减少对外部相关产品市场的依赖的开放模式。

2. 开放模式的可能性

一个区域的开放是否具备“模式”的所有要素,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一国给定的宏观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下,一个次区域能否呈现其独特性?特别是以国际开放为主导的对外开放,其政策上的自主权受到国家宏观层面的统一控制,其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或状态的独特性是否能得以充分的体现?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差距和差异明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分权化、民营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尽管这三个过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分权化为区域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特性提供了空间。换句话说,分权化过程使得地方行政当局有足够的动力和权力按照区域发展的差异制定差异性的发展目标、策略,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状态或路径。

区域开放的模式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1)资源的循环方式,主要是指参与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来源于区域或经济体内部还是外部。一般而言,一个区域或经济体开放过程中资源循环的方式可区分为体内循环(internal cycle)方式、体外循环(external cycle)方式和综合循环(compositive cycle)方式。所谓体内循环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所动员的经济要素主要依靠经济体内部的各种资源实现,尤其是生产过程所需的各种投入要素,而对外关系只发生在消费领域。所谓体外循环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动员经济体外部的各种资源实现经济体内部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综合循环方式则是指经济体仅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既不参与生产资源的动员与组织,也不参与生产结果的分配与消费,即所谓的“两头在外”或“飞地”。

(2)开放的目的,即一个区域或经济体参与开放是为了实现何种直接的目的。关于开放的目的论可能引起的分歧是,开放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存在目的问题。但是在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转型目的(终极的或阶段的)就可能而且应该在开放的进程中加以体现。尽管这种目的的归类并不容易,但是还是可以大致地罗列出一些开放的目的。如创汇型开放,即在对外开放(主要是贸易)中,以最大可能实现外汇积累为目的。中国开放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是实行创汇型开放(甚至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对外开放)。技术引进型开放,即对外开放以引进技术、提高本土企业创新能力为目标。补充型开放,即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弥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某些环节而进行的。合作型开放,即开放的目的是实现区际(国际)的合作,

包括政治合作和经济合作。例如双边开放、一体化等都是属于合作型开放。不同目标的开放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转换,如起初以创汇为目的的开放在发展的一定程度会转变为技术引进型开放。

(3)参与开放的微观主体特征,即参与开放的微观主体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是生产型企业还是服务型企业;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参与开放的微观主体全部是国有企业,而且是以大型的服务型企业为主,国有进出口公司完全垄断了对外开放。

(4)开放的程度或水平,包括零星的开放、局部控制的开放和完全的开放。零星的开放是指开放仅小规模,偶然性地发生于经济社会的某些领域,其参与主体是完全自发的,如原发的边境贸易等。局部控制的开放是指开放在经济社会的某些领域和某些区域展开,并且其产业领域和区域范围受到政府的控制。例如中国最初设立的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到后来的沿海开放城市等,都是将开放控制在局部的区域范围之内。完全的开放是开放的最高层次,指开放的领域和区域并不受到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但这并不排除政府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措施以及对部分产业的进入限制。

(5)内外互动的方式,即开放进程中经济体内部主体与外部主体参与开放交互的形式。在一个经济体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内外互动的方式主要包括内源主导型开放(endogenesis-dominant opening)、外源主导型开放(exogenesis-dominant opening)以及混合型开放(composite opening)。内源主导型开放是指一个区域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中,经济体内在的力量主导了整个开放的进程,其开放的动因来自于经济体内在的需要,开放的进程和节奏依赖于经济体内在主体的发展进程及其需求,开放的主动权掌握在经济体内部。而与此相对应的,外源主导型开放则是指在一个区域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中,经济体的外部力量主导着整个开放的进程,开放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外部,开放的进程和节奏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而混合型开放则是指内部和外部的力量交替或者共同控制开放的进程,主导着开放的节奏。

三、浙江开放模式:逻辑与要点

(一)浙江开放模式的内涵界定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省开放进程的典型特征是内源主导型的开放。所谓内源主导型开放,是指推动经济体由封闭向开放转型的主导力

量是该经济体内部的各种经济主体,是其自身不断成长壮大进程中自发要求而推动的在市场、生产过程、要素等各个层次的开放转型。其开放转型的路径一般是顺比较优势的,即首先是市场范围的扩大,逐步突破区域界限,走向开放;然后是生产过程逐步开放,不断融入开放经济的生产分工体系;最后是要素核心领域的开放,特别是资本和人力资本领域的开放。有时候,我们也把这种路径称为“倒逼型”,之所以说是“倒逼”,是因为对于内源的经济主体而言,如果市场开放没有获得足够高的收益率,其推动开放深入的动力是不足的。只有在浅层次开放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这些经济主体才有动力将开放推向深入。

封闭经济体向开放经济转型还存在对应的其他两种类型,即外源主导型开放和混合型开放。所谓外源主导型开放是指推动经济体开放转型的主导力量主要来自经济体外部。经济转型的特征与形态,与经济体内部固有的经济形态特征并不十分紧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开放转型是比较接近于外源主导的。混合型开放是介于两者之间,即经济体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共同或者交互作用于经济体的开放进程。

之所以说浙江开放进程的典型特征是内源主导的,是因为:

(1)浙江省对外开放进程中,境内民营经济成为参与这个开放进程主体和主导力量,而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生发展正是浙江经济内源发展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浙江省处在这一工业化进程的边缘。中央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投入浙江省工业建设的项目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么少的国家资源在浙江省也被主要投在了杭州、宁波等城市。与此同时,其他地区尤其是浙南地区在国家主导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进程推进相当缓慢。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率先推进和农村资本劳动力要素的解放和积累,以个体经济为主的农村工业化迅速展开。这些个体经济正是构成了浙江内源民营经济的初始状态。这些个体经济源源不断地产生发展,最终成为浙江省地区经济的主导力量,并冲破政府的区域和国境管制藩篱,实现了区际和国际的开放。

(2)内源力量主导了浙江省开放的进程。在浙江省对外开放进程中,内源力量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全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浙江省并没有迅速走向国际开放。浙江省对外开放首先起步于区际开放,即大量的民营企业依靠国家的开放政策,获得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从而首先面向国内实现区际开放。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源型民营企业面临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先发优势的逐步丧失,纷纷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开放。

(3)对外开放内生于浙江省经济发展的阶段要求。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典

型地依靠市场化和民营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在这个发展进程中,国际化仅仅是衍生的或者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推动力量。更确切地讲,国际化或者开放是内生于市场化的阶段性推进的。市场化的初始阶段是区内市场化,推动了农村最为原始的工业化,个体户的大量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小城镇的出现和勃兴。但是随着个体户资本技术的积累,推动了市场的拓展,从区内市场拓展到区际市场。在这一阶段,大量的个体工业企业实现了快速的资本积累和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得以快速推进,出现了所谓的“家家办厂,村村冒烟”的情形。同时,城镇化加快推进,形成了一大批具有相当实力的城镇。经过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市场化的范围进一步拓展,从区际化拓展到国际化,一大批具有相当实力的民营企业走出国门,推动了浙江省外贸出口的急速增长。

总体而言,浙江省内源主导的开放具有如下特征:

(1)民营经济是开放主体,无论在推动力量上、参与对外贸易和合资合作上,还是开放阶段转变的阶段掌握上,内源型的民营经济都起着主要的作用。

(2)这种开放是顺比较优势的开放,即内源经济力量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逐步实现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在空间上,遵循区内开放—区际开放—国际开放的路径;在内容上,遵循的是市场开放—生产开放—资本开放的路径。

(3)贸易结构与本地产业高度吻合,是典型的市场拓展型开放。一方面,对外贸易中更多的集中于本地的优势产业,这些优势不仅体现在成本上,更体现在生产的规模上;另一方面,开放导致的市场规模扩大进一步强化了本地的优势产业。

(4)开放较强地依托于产业集群。由于内源成长的企业在资本、技术和生产规模上并不具有优势,而且连要素禀赋优势在国际开放之前也是不显著的。产业集群形成的“块状经济”则是可以首先加强的报酬递增优势,大量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巨大的外部规模经济,替代了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同时分工与专业化得以深入的展开,专业化的优势替代了企业的技术优势。因此即使单个企业并不具备规模和竞争力,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却异常强大,从而比较顺利地推进了内源主导的开放进程。

(5)开放的进程注重市场拓展,轻要素汲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对于国际市场的渴求远远超出对国际资本、技术和高素质管理经营人才的需要。这可能是阶段性特征,也可能是这种开放模式的主要弊端。

(二)浙江内源主导型开放的决定因素

(1)浙江省特定的要素禀赋特征决定了浙江省的开放模式特征。浙江省

历来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同时,自然资源匮乏。依靠资源攫取型的生产和开放显然无法支撑浙江经济的发展。因而,也不存在外部力量觊觎本地资源而主导本地开放的进程。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经济规模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在全国处于下游水平,市场规模不大,这也就决定了外部力量也不太可能因为本地的市场规模而介入开放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反而获得了一个相对不受外来因素影响的发展和推动开放的外部空间。在这个外部环境中,浙江省的内源经济得以迅速地成长,并以其为主导,阶段性地推进开放的进程。这种内源经济的成长并不依赖于本地的资源条件,而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即资源、原材料在外和市场销售在外。这也就决定了浙江省内源经济天然就具有开放性,是依赖开放而生的。没有市场的开放,浙江内源经济的成长条件将更加恶劣。尽管起初的开放是在政策的夹缝中形成的,但是这种开放毕竟给浙江内源经济提供了一个不受外部干扰的良好空间,并且在夹缝中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2)市场型企业家禀赋决定了浙江开放的进程中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在浙江省自然资源禀赋贫乏的情况下,孕育了众多的市场发现型和风险承担型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尽管在生产技术和知识文化水平上并不具有多高的素质,但是在市场的发现和对风险的承担能力上,却有着高超的技艺。良好的市场感觉,极具拓荒精神的市场开拓,加上由于区域地理文化因素造就的冒险精神,使得浙江省的企业家能在生产要素和资源贫乏的情况下,依靠“两头在外”的市场拓展能力,发展自身的生产能力,从而推动工业化和内源经济的发展。

(3)浙江省的产业基础及其与开放的互动关系决定了浙江省的开放具有显著的内源主导特征。浙江省的产业基础是典型的“轻、小、集、加”。“轻”即是指浙江的产业以轻工业为主;“小”是指浙江的企业规模偏小;“集”是指浙江的工业生产存在明显的集群现象;“加”是指浙江的产业以加工工业为主,附加值较低。而且,浙江的开放进程对产业结构的固化效应超过了变迁效应,也就是说,顺比较优势推动的开放主导了开放的进程,而外部产业对本地产业的影响效应则要远远弱于因市场推广导致的本地优势产业规模的扩大。从而在开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优势产业促进了市场开放范围的不断拓展;反过来,市场开放范围的拓展也强化了优势产业。

(4)浙江省较为分权的行政体制,进一步强化了内源主导的开放模式。越位于基层的政府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动力要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基层政府手中掌握的经济发展主动权越多,则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越高。浙江省以省管县财政体制为代表的分权体制,形成了“以县为主体,乡镇为前沿”

的经济发展格局,乡镇工业发展迅速,县域经济强大。而在要素和资源约束前提下,乡镇工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内源经济的培育和发展。这种扶持既表现在市场准入方面,也表现在积极提供公共资源和对政府“掠夺之手”的抑制。特别是以专业市场兴建为代表的政府扶持行为,和以“无为”为特征的政府对内源经济发展的默许和“纵容”,极大地推动了内源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强化了市场为主导的开放拓展。

(三)内源主导型开放的利弊

总体上,内源主导的开放对浙江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于:

1. 推动了浙江省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的跨越

浙江省资源禀赋贫乏的现实,使得依靠封闭的发展无法突破基本生产要素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两头在外”的市场开放进程,最大限度地突破了浙江省的资源限制和流通渠道的限制,使得浙江省的生产能朝分工与专业化的路径演进。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浙江省加工工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2. 使得本土经济最大限度地分享了开放的利益

浙江省的开放进程以内源经济为主导,同时,又是以市场开放为主体,开放的进程本身就是以内源经济的利益驱动为导向推进的,因此内源经济的利益在开放进程中不断得以诉求和获得。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值远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省份,这个现实说明了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情况下,本土经济获得的实惠要高于其他的开放模式。

3. 内源经济的发展机制在开放进程中得到维持和强化

内源主导的开放进程中,开放的阶段推进和节奏主要掌握在内源经济手中。内源经济的发展需求推动了开放的阶段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内源经济发展的机制并没有因为开放进程而遭到破坏。相反,每一次开放进程的推进和阶段转换,都是内源发展路径演进的结果,是内源发展机制的外在体现之一。

4. 在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方面获得了良好的绩效

由于内源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各地的农村工业化,广泛而深入的工业化发展是以乡镇为主要载体,以县域为主要单位的。因此,浙江省大部分乡镇的工业都得到了有效的发展,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集群,而且由此推动了强大的县域经济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工业发展中大区域范围内的不平衡问题,各个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对不会持续扩大。



但是,就当前而言,浙江省内源主导型开放模式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 产品国际化与企业国际化的分离

一方面,浙江省内源企业的产品市场范围从区内市场向区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开放进程发展迅速。相当一批工业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某类产品的加工制造中心。同时最近 10 年来,浙江省的外贸出口额都占据全国较高的比重,这得益于其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可以说浙江省内源企业产品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浙江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弱,FDI 比重一直偏低,企业的跨国合作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相接近的其他省份。产品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

2. 潜在市场势力与现实市场势力背离

内源主导型开放的主要动力是市场开放,而开放的主要优势在于价格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价格竞争的强大市场拓展能力与市场价格的加成能力形成了明显的背离问题。一方面,浙江省在一批工业产品的国际国内市场份额上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有些还处于绝对的市场垄断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在市场定价权上,无法形成市场势力。市场价格偏低,企业竞争激烈,对企业创新和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3. 创新弱化与产业锁定

内源主导型开放通过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获得开放利益。这种市场开拓能力上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企业的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努力。在开放的进程中,开放对产业结构的固化效应超过了变迁效应。企业的研发投入低于同等发达水平的其他省份,使得浙江省的内源主导型开放进程对浙江的产业结构存在某种意义上的“锁定”效应。

(四)浙江内源主导型开放的战略选择

1. 实施质量效益型开放战略

从浙江对外开放整体贸易结构看,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出口主体,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数量扩张带动的,其出口的多为科技含量较低、附加值不高的粗放型产品,致使浙江对外贸易结构总体层次和效益较低。因此必须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实现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为此,首先应优化科技创新体系,提高产品整体质量,力争部分优质产品生产与国际技术标准接轨。其次,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不断提高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质量改进实施者的获利能力,激励生产者改进产品质量。

2. 培育基于高级要素的国际竞争力

高级生产要素主要是指知识与技术。长期依赖低成本竞争一直是浙江贸易迅速发展的主要特点,即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使用费以及相关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等。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这种依赖低成本的开放模式的竞争与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不断提高国际要素的汲取能力,积极汲取国外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在更高层次与更广领域优化资源配置,为此,必须从进口贸易、引进外资、对外投资多个方面来增强要素的汲取能力。

首先,要积极合理地扩大进口,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力度。其次,要以引入国际化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实现利用外资重点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最后,要积极推动浙江企业的技术与品牌导向型的对外投资。

3. 增进企业的国际市场势力

市场势力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资源,是企业市场地位的集中体现,但浙江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普遍缺乏市场势力,这将对浙江开放模式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而逆转市场势力不明显的不利局面,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改善浙江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增强企业的国际市场势力,一方面要优化产业组织,通过核心企业的“市场代言”或企业联盟的“共同代理”来促进产业市场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带动小而散的企业获取市场势力;另一方面,浙江企业应该通过整合全球要素,积极寻求技术创新和经营模式的创新,实现创新与国际分工前移及市场势力构建的有效互动。

4. 打造国际性专业化产业区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实现从现有的区域性专业化产业区向国际性专业化产业区转型和升级已成为浙江众多专业化产业区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国际性专业化产业区应具备以下五大基本功能,即国际性产品生产基地、国际市场份额的主导占有者、价格形成中心、信息与知识流转中心以及研发与创新中心。对照国际性专业化产业区目标模式的基本要求可以看出,浙江的不少产业区现已具备了生产总量大、市场份额高、成本与价格优势显著以及高效的本地信息与知识网络等现实条件;但同时,这些产业区在市场势力、信息传导与知识流转以及研发与创新水平等方面的产业主导功能和领先地位尚未完全显现,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性专业化产业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要在不断增强自主研发(R&D)的同时,积极汲取外资和国际性的技术、人才、品牌等要素资源,不断地提高专业化产业区的国际竞争力。

5. 构建基于功能性政策的支持与服务体系

所谓功能性贸易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培育人力资本,提升获得性要素的比较优势,同时通过经济杠杆、信息服务、法律体系,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等与其他经济政策相融合的方式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贸易政策。这种功能性政策是一种既符合 WTO 的规制要求,又有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政策。

实施功能性贸易政策最主要的是要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实施知识援助政策,包括提供信息服务体系、提供人才培养与支持体系、建立产业预警体系。二是实施有效的制度供给政策。要克服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法制环境、融资环境、审批管制、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制度障碍,以提供公平、开放、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四、区域开放:文献的简要回顾

(一)国外研究现状

1. 理论研究

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hlin)早在其名著《区际和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1933)中首次用区际贸易代替国内贸易,认为区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地区间存在相对的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上的差异,而且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各自的需求,最终由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来决定价格体系和贸易。1935年,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力图把贸易与布局理论结合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一国内部区域经济纳入分析系统之中,开拓了贸易与生产布局关系研究的新领域,给予区域贸易、区域经济以更大程度的关注。

以 Paul Krugman 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则将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 20 世纪 90 年代, Krugman 先后出版《地理和贸易》、《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和《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等专著,引领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他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为区域增长及区域发展模式的转变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主旨在于将空间因素融入主流经济学框架之下,并最终将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融为一体。在 Krugman 等人看来,一国内部的区域经济和国与国之间的国民经济没有实质性差异,贸

易只涉及贸易成本因素,经济集聚之核心—外围分野最为重要。事实上,Krugman 等人的“核心—外围”理论,既用来解释国际经济格局,也可用来解释国内区际经济结构。

2. 实证研究

国外对经济开放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较多,不过大多仍然局限于国民经济层面的研究。Edwards(1998)考察了 92 个国家 1960—1990 年间对外开放与其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证明在经济开放与 TFP 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联系,相对于保护主义盛行的国家,对外开放充分的经济趋向于经历更快的 TFP 增长。Weinhold 等人(1997)也实证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开放与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揭示了前者对后者有提升作用的机理。Cameron(1999)等人自行建立了一个由出口/国内产出、进口/本地销售、内向 FDI/产出、外向 FDI/产出和贸易加权的国际 R&D 存量/产出五个比率构成的指标体系,并据此测算了英国制造业 19 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与开放之间的相关性,得出结论:对外开放多半是通过技术进步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库兹涅茨(1991)通过对各国的国际贸易依存度进行统计,发现大国的贸易依存度普遍低于小国,这揭示了大国内部的区域经济之间本身就孕育着巨大的比较利益,各个区域可以区际分工代替部分国际分工。而著名区域经济学家 Moore(1996)认为,一个地区的开放性以及与其他地区的相互依赖性对其来说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区际经济的开放意义远远胜过小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市场巨大、国内贸易机会利用不充分的发展中大国来讲,国内贸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出比对外贸易更大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现状

1. 理论研究

浙江学者较早地将区际开放与国际开放问题运用于中国经济以及浙江经济开放模式的研究中,赵伟(2001)提出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区域开放肇始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坚实的私有产权制度,另一个是繁荣的地区贸易。一般来说,正是私有产权制度促成了区域性市场的形成与地区贸易的兴旺,而兴旺的地区贸易,则成为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基础。作为一种转型经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这决定了中国各个地区层面的开放,采取了独特的方式,由此而形成独特的区域开放模式。赵伟(2002)对中国两大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 20 世纪 80—90 年代开放重心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大三角洲的经济开放路径明显不同,长江三角洲



地区走的是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路径,即先从区际一边突破,而后以区际贸易与区际要素流动为依托,大踏步进军国际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推进区域经济国际开放;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反其道而行之,先国际化而后区际化,即在若干年内,先将开放重心置于国际一边,在国际开放上取得超常规进展,而后以国际开放为依托,拓展国内区际开放。但目前的发展趋向表明,两大三角洲的区域开放最终将殊途同归,达于区际、国际并行开放的境地。其中,在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论述中,提及了浙江省对外开放的发展路径问题。

赵伟(2006)对先前的研究给予经验性的总结,指出中国总体上是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的路径模式,而在多个层次的区域又体现出某种例外,在所有例外中又属三个层次的例外最为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大区域层次之沿海三大工业化地带,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开放路径与中国总体的区域经济开放路径一致,属于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的路径,而长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开放路径与中国总体路径不同,属于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路径;第二个是省、市际层次之江、浙、沪经济区,相比较而言,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开放路径在浙江最为明显,江苏其次,上海两可;第三个是省内县、市域区域层次,在浙江可以看到宁波与温州、台州的差异,具体来说,宁波的国际化要先行于浙江其他地区,尤其是同属“沿海之沿海”的温州与台州,区域经济开放带有明显的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特征,这与浙江经济总体的先区际化后国际化路径截然不同。

国内其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浙江内源式经济的开放提出了见解。叶建亮、黄先海(2004)系统讨论了内源式民营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的具体路径问题,认为内源式民营经济的对外开放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启动:要素投入、生产分工、拓展市场,从而指出我国省域的对外开放至少存在三种基本模式:“顺推型”的“广东模式”、“倒逼型”的“浙江模式”以及“扩散型”的“苏南模式”,并从民营经济的发展基础和态势考虑不同开放模式转型的初始条件。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内源式民营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不可能采取“顺推型”的路径,因为缺乏大量引进外资的基础;也不可能采取“扩散型”的路径,因为缺乏强技术创新能力的支撑。比较切实可行的战略是:以“倒逼型”的转型为主,辅之以“扩散型”和“顺推型”的道路。黄先海(2008)把浙江开放模式界定为顺比较优势的“倒逼型”开放模式。这主要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在对外开放的基点上,浙江的开放是立足于浙江的要素禀赋,特别是立足于发挥和增进内源式经济(主要体现为民营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逆比较优势去扭曲经济主体的行为,典型地符合经典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第二,在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上,浙江的对外开放是从市场(贸易)层面启动的开放,即由市场的区际开放和国际开放起步,进而推动生产过程的国际化,逐

渐融入全球分工协作生产体系,进而通过外资的引进嫁接改造企业股权体系和治理结构,完成要素投入的国际化。

程惠芳(2000)探寻了浙江省产业结构国际国内的动态转移和循环升级模式,提出浙江省开放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包括:强化轻纺工业比较优势和培育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发展工业经济新优势;大力发展以高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业,培育第三产业新优势;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创建浙江省产业结构国际国内转移、东部西部梯度推进的动态循环发展模式,实现浙江省经济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的转变等。杜群阳、程惠芳(2005)通过内外资融合四层次模型的理论分析,对浙江吸引外资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改革引进外资评价机制,建立“内外资融合四层次评价模型”;二是树立“以民引外,以外促民,内外互动”的引资策略;三是接轨上海,利用外资的技术、市场溢出效应;四是拓展统一的长江三角洲产权交易市场,服务于内外资互动。

金祥荣(2000)从国际经验考察提出,有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只是给它们带来短暂的繁荣也即静态收益的提高,相反却导致了长期衰落,关键是在世界性的比较利益结构性变化中,逐步失去了应有和过多的动态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如何提高动态效率或要素贡献上,而不是简单地计算或看重一时的静态收益。动态比较利益贡献重于静态利益贡献。就浙江省而言,是一个人多地少的资源小省,已建立形成了以发达的轻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区际分工。浙江应关注比较利益的动态变化和转移,而不是固守静态比较优势。金祥荣(2003)指出,依靠体制优势带来的内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利用外资规模相对较小。90年代浙江的发展经验已经逐步显示出,依靠企业自身积累不仅扩展速度相对较慢,而且极易导致企业停留在低水平的数量扩张以及锁定于家族制经营状态,难以形成对新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需求,无法通过利用外资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以及“嫁接”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

方民生、朱家良等学者也对浙江发展模式转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方民生(2005)认为,浙江从“内源型发展模式”向“内源与外生相融合的发展模式”转变是理性的判断。激发民营经济利用国外资源的活力,寻求浙江特色的利用国外资源的发展模式的理念是构建融合发展模式的基本条件。当前值得重视的路径则是注重利用外资的多样性、对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利用外资的方式、发展本土的国际性公司、重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朱家良(2005)从民营经济国际化角度探讨了义乌从区际开放走向国际开放的路径,与温州有很大差异。小商品交易市场从区域性集散市场到全国性集散市